

《淨明忠孝全書》的版本、內容及意涵概說

許蔚博士（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淨明道，一般而言，主要指宋元時期興起的，以許真君信仰為核心，提倡忠孝成仙，兼修內丹與符籙的道教派別。嚴格地說，則可以分為南宋淨明道、元代淨明道等兩個不同的傳承。南宋淨明道並非突然間成立的，其前身可以追溯至晉宋時代流行於廬山宮亭湖區域，以伏蛟治水法術聞名的孝道派。而元代淨明道成立之後，到明清鼎革，作為其後身，則又有宗室遺民朱道朗在南昌青雲譜創立青雲派，再續淨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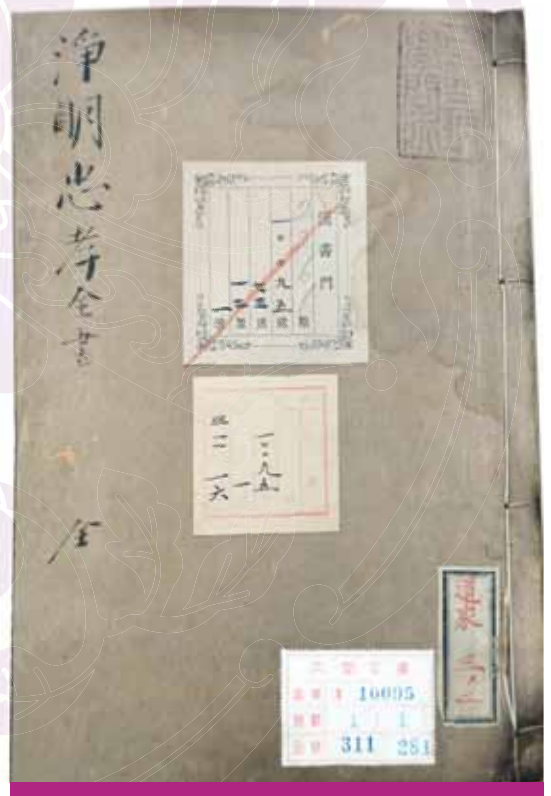
南宋淨明道最初成立於建炎二、三年（1128、1129）間，以來自海陵的候任官員周方文為首，在臨江軍新喻縣從事降真造經活動。後因金兵南下，教團活動遂告終結，周方文也轉往舒州任官¹。紹興元年（1131），何守證等人在洪州西山玉隆萬壽宮建翼真壇，再行降經，淨明道遂得以延續，並盛行一時。這兩次降經所出經典，基本上均保存於《正統道藏》之中。

元代淨明道創自西山鄉儒劉玉之手。他自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初遇胡慧超，次年（1283）於孝行里建騰勝道院，開化度人，後九年（1292），移居黃堂山烏晶原，弟子王真定、方公成等則就近居於紫清宮。後三年（1295），他與王真定、方公成登紫清宮拍洪樓，初獲胡慧超降授〈淨明大道說〉。此次仙真降經造成一定的聲勢，吸引了玉隆萬壽宮清逸堂道士黃元吉的加入。次年，劉玉便與黃元吉以及王真定、方公成、胡次由等，在烏晶原劉玉宅中，再獲許遜降授〈玉真靈寶壇記〉、郭璞降授〈玉真壇疏〉。大德元年正月，劉玉登「靈寶朝天壇」，從許遜受中黃大道八極真詮；十月，住玉隆萬壽宮清逸堂，又獲胡慧超降授〈淨明道法說〉及三五飛步正一斬邪之旨，「由此開闡大教」。大德二年（1298），再獲郭璞降授〈淨明法說〉。至此，該教團的主要經典均已出世。這批文字後編入《淨明忠孝全書》，保存於《正統道藏》之中。

《淨明忠孝全書》是目前所知元代淨明道唯一流傳下來的典籍。該書現存已知版本，凡有明《正統道藏》本、明景泰三年（1452）邵以正序刊本、清嘉慶雲南刊本、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黃元安鉛印本以及某道壇抄本等五種。其中，清嘉慶雲南刊本為臺灣李顯光先生所藏，僅殘存附錄〈許真君七寶如意丹〉一冊二十餘葉；清光緒鉛印本原藏南京圖書館，今已不知去向；某道壇抄本為臺灣李豐楙先生所藏，目前未能見到，有關情況尚不明確。

關於該書的成立，據劉玉語錄自述，最初他將許遜、胡慧超等仙真降示的諸篇文字彙編成書，名為《淨明忠孝之書》。這一《淨明忠孝之書》當時是否刊刻，或者僅為道團內部抄寫流通，目前沒有明確的證據予以證明。但其內容則很明確，即僅包含〈玉真靈寶壇記〉、〈淨明大道說〉、〈淨明道法說〉、〈淨明法說〉以及〈玉真壇疏〉等五篇文字而已。至於此書成立的時間，則不能早於大德二年〈淨明法說〉降世之時。

至大元年（1308），劉玉歿。後十五年（1323），黃元吉入京，內有《淨明忠孝書》及《玉真語錄》，曾授予逗留在京的吉安儒生徐慧，並囑其將來續刻劉玉語錄。其中，《玉真語錄》為黃元吉所刻，《淨明忠孝書》似乎也是刻本，但不知是否黃元吉所刻。就內容而言，《玉真語錄》是劉玉的語錄。《淨明忠孝書》，根據元人諸序，則除了〈玉真靈寶壇記〉等淨明大道文字以外，還應含有包括劉玉傳在內的仙真傳記，因而可能是在劉玉所編《淨明忠孝之書》基礎上增補而成。



明景泰三年邵以正序刊本《淨明忠孝全書》，現存為日本內閣文庫藏本

泰定二年（1325），黃元吉歿。後二年（1327），徐慧繼起編刊。據其自序所述，他將黃元吉未及刊行的劉玉語錄編為《別集》，又補入黃元吉的嫡傳弟子玉隆萬壽宮清逸堂道士陳天和所編黃元吉語錄，「並以元所傳〈靈寶壇記〉、〈道說〉、〈法說〉忠孝諸書皆鋟梓而流傳之，總名曰《淨明忠孝全書》」。這是元代淨明道系列文獻首次以《淨明忠孝全書》為名刊行，時間則是泰定四年。此一《淨明忠孝全書》是在黃元吉舊本《淨明忠孝書》及《玉真語錄》的基礎上增補完成，除增補前述兩種語錄之外，似乎也應循例增補虞集所作黃元吉碑銘。

至正十年（1350），徐慧歿。次年（1351）春，其弟子上官良佐前往徐慧生前所住吉安永和清都觀致奠，並據其子徐師晉所述，撰為〈丹肩道人事實〉（據明景泰三年邵以正刊本保留的上官良佐跋）。該傳是否即行增補刻入《淨明忠孝全書》，並無證據可予證明，但至少應在清都觀及徐慧門下弟子間，以附錄於徐慧舊刻《淨明忠孝全書》的方式抄寫流通。

徐慧舊刻流傳不廣，附錄徐慧傳的本子似乎也僅在吉安個別宮觀內部流通，到明洪武末重刊，去徐慧舊刻已逾七十年，期間罕有人見過。關於此次重刊，明景泰三年邵以正序刊本保留有洪武三十一年（1398）曾恕序，可知該書重刊於洪武三十一年頃。據該序所述，《淨明忠孝全書》原秘於吉安永新昊天觀，至洪武三十年（1397），南昌常清觀周定觀從京師返鄉，攜該本至南昌宗華彭真觀，出示鍊師魏希然及其徒萬象先、胡孔聞等人，遂由胡孔聞校正並書，西山徐古愚出資刊行。周定觀從何處得到這一吉安昊天觀古本，沒有明確的記載。鑒於他是丁母憂，從京師（南京）返回南昌的，不大可能專程繞行遠道前往吉安取書，然後再折返南昌，因而，不排除是從時住朝天宮的贛州高道劉淵然處得到該本的²。至於該本之內容，儘管原書已無法見到，但明景泰三年邵以正序刊本是以洪武末刊本為底本，增補趙宜真、劉淵然傳而成，因此，可知除了徐慧舊刻的內容以外，還應含有徐慧傳。該本刊行後，到邵以正增補重刊時，已是「板毀不存」。而邵以正增補重刊之後，到嘉靖元年（1522）則有南昌鐵柱宮住持鄧繼禹據邵以正所刊本再予重刊³。

需要說明的是，洪武末刊本與所謂「劉淵然刊本」是何關係。所謂「劉淵然刊本」的說法，不見於明人記述，而出自數百年之後的清嘉慶雲南刊本。該本殘存附錄〈許真君七寶如意丹〉一冊，其中尚保存有朱桂芳〈許真君七寶如意丹後序〉一首。據該序所述，該本所據底本為昆明縣朱桂芳家藏「長春劉真人刊《淨明忠孝全書》一卷」⁴。這個所謂的一卷「劉淵然刊本」，由於清嘉慶雲南刊本原書已不存，而朱桂芳又沒有進一步的描述，難以證明是否真的存在。

劉淵然曾在永樂初年謫居雲南，洪熙元年（1425）還朝，上書請建雲南、大理、金齒三道紀司，對雲南道教發展有深遠影響，其嫡傳弟子邵以正也是在雲南拜入門下的。而明景泰三年邵以正序刊本所保留的舊序僅有前述洪武三十一年曾恕序。該序只提到《淨明忠孝全書》出自昊天觀秘藏，而沒有提到曾有一種劉淵然刊本。並且，邵以正的自述也完全沒有提到劉淵然曾刊行《淨明忠孝全書》。由此，似可認為所謂「劉淵然刊本」並不存在；而朱桂芳很可能只是將其收藏的某本《淨明忠孝全書》稱為「劉淵然刊本」而已。僅就目前所知，即便真的存在所謂「劉淵然刊本」，也應該就是邵以正據以為底本的洪武末刊本⁵。

關於明《正統道藏》本，就內容而言，是含有徐慧傳的本子，因而其底本不可能是徐慧所刊本。當然，由於該本僅保留有徐慧以上的元人諸序，而沒有明人序跋，也就無法確定其底本是否即洪武末刊本。明萬曆時楊爾曾編校《許真君淨明宗教錄》十五卷，在內容上幾乎將《淨明忠孝全書》盡數收錄，並且還保留有《淨明忠孝全書》的書名，因而，相關內容可視為《淨明忠孝全書》的一個別本。就該書卷十五所收〈淨明忠孝全書序〉僅包含元人諸序，而傳記、語錄等其他內容也與明《正統道藏》本幾乎完全一致的情況來看，似可認為該書所據以編錄的底本應為明《正統道藏》本。

另外，據明黃嘉善校刻本《古今書刻》著錄，《淨明忠孝全書》在明代尚有山西山陰王府刊本。山陰王府是代王朱桂支系下的郡王府，初代朱遜熾永樂十二年（1414）封，成化三年（1467）薨，到《古今書刻》成書的隆慶、萬曆年間，在位者已是第五代朱俊柵，嘉靖三十七年（1558）襲封，是位喜好佛法的郡王⁶。而《淨明忠孝全書》刻於何代郡王之時，並無明文記載。鑒於《古今書刻》所著錄山陰王府所刻之書共計十二種，除《淨明忠孝全書》外，均為佛教典籍⁷，那麼，這批書很可能就都刻於朱俊柵在位時期。如果這一推測能夠成立，那麼，山陰王府本就有可能是以明《正統道藏》本或者明景泰三年邵以正序刊本為底本。當然，如果山陰王府本刻於康惠王在位時期，則不排除在明《正統道藏》本之前問世，但不會早於永樂十二年，即至少在洪武末刊本問世十餘年之後問世，那麼，其底本便有可能是洪武末刊本。

二

明景泰三年邵以正序刊本，現存為日本內閣文庫（今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原為日本江戶時代朱子學者林羅山舊藏，木夾板一函，綫裝一厚冊，經托裱重裝，四周雙邊，黑口，雙黑魚尾，正文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三至二十五字不等。該書前有景泰三年壬申秋十月朔胡濬序、洪武三十一年戊寅秋八月望日曾恕

序，後有景泰三年壬申中秋日邵以正後序。該本未分卷，作一卷計，與《天一閣書目》著錄鄧繼禹重刊本作一卷是一致的，與清嘉慶雲南刊本所謂「劉淵然刊本」一卷也是一致的，而與明《正統道藏》本分為六卷的形式不同。據胡澹序、邵以正後序所述，該本是以舊本為底本，增補趙宜真、劉淵然二人傳記而成。所謂舊本，根據該本僅保留曾恕序，可知即洪武末刊本。

除以上前後三序以外，該本內容依次為仙師傳記、〈淨明靈寶忠孝書序〉、〈淨明靈寶忠孝全書〉、〈西山隱士玉真劉先生語錄外集〉、〈西山隱士玉真劉先生語錄外集〉、〈西山隱士玉真劉先生語錄別集〉及〈中黃先生黃真公答問語錄〉。

其中，〈淨明靈寶忠孝書序〉依次包括張珪、趙世延、虞集、滕賓、曾巽申、彭堃及徐慧序，與明《正統道藏》本所保留的徐慧以上元人諸序在內容、順序上均屬一致。〈淨明靈寶忠孝全書〉依次包括〈玉真靈寶壇記〉、〈淨明大道說〉、〈淨明道法說〉、〈淨明法說〉、〈玉真壇疏〉等大道文字，也與明《正統道藏》本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元人諸序統題「淨明靈寶忠孝書序」，表明諸序可能原為《淨明（靈寶）忠孝書》所作；而「淨明靈寶忠孝全書」的獨立題名，也不見於明《正統道藏》本，但其內容確屬《淨明忠孝之書》，因而可以認為二者保留了《淨明忠孝全書》成書過程的遺跡，反映出《淨明忠孝全書》元代刊本的實際面貌。而〈西山隱士玉真劉先生語錄〉、〈外集〉、〈別集〉及〈中黃先生黃真公問答語錄〉內容、次第也均與明《正統道藏》本一致，但同樣保留了元代刊本的舊式，並且也鮮明地反映了《淨明忠孝全書》為彙刻諸書的事實。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仙師傳記部分是該本與明《正統道藏》本之間最大的差異所在。在形式上，此部分置於元人諸序之前，與明《正統道藏》本的次第明顯不同。在內容上，此部分除增補趙宜真、劉淵然二位真師的傳記以外，每傳後還相應地附刻有許遜、張蘊、胡慧超、郭璞、劉玉、黃元吉、徐慧以及趙宜真、劉淵然等人像、讚。其中，徐慧以上的像讚均為元人舊撰，表明元代刊本應該是附刻有諸真像、讚的，而明《正統道藏》本不論是以元代舊本還是洪武末刊本為底本，顯然是將有關像、讚省略未刊。至於《許真君淨明宗教錄》所收仙師傳記附刻像、讚，儘管無論是圖像還是文字都有很大的改動，仍表明楊爾曾可能見到並利用了洪武末刊本或邵以正系統的刊本。

另外，該本各傳大多相應保留有撰者署名以及有關讚、跋等內容，比如〈淨明道師旌陽許真君傳〉署「瓊瑤紫清真人白玉蟾撰」、〈西山隱士玉真劉先生傳〉署「應召通真靈妙明德法師教門高士玉隆萬壽宮提舉宮事許宗聖撰」並有附讚、〈中黃先生碑銘〉署「奉訓大夫祕書少監虞集撰並書、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曾巽申篆額」並附題墓者「集賢待制番禺吳善」跋、〈丹肩道人事實〉附作者「西山樵者武陽上官良佐」跋等，無論是在內容還是形式上，均較明《正統道藏》本更為完善，也更能反映元代刊本或者元代舊本的實際面貌。而明《正統道藏》本在內容上的此種刪減，特別是對有關圖像的省略，並非特例，在《正統道藏》所收其他文獻中也經常能夠見到。

需要說明的是，仙師傳記部分雖然在內容上大體保持元代舊貌，但置於元人諸序之前的形式是否同樣保持了元刊舊式，尚難斷定。就目前所知，這一形式尚無法得到其他文獻的支持，特別是明《正統道藏》本已是經過大量改動的文本，因而無法作為支持或者否定的依據來提供版本上的印證，因而，一方面不排除這一形式確實保持了元刊舊式或者說元代舊式的可能；同時，也不能排除這一形式是邵以正重刊時所作調整的可能。另外，許遜傳的署名顯然也並不可靠，因該傳內容與白玉蟾〈旌陽許真君傳〉實際存在較大差異，而該本之所以署名白玉蟾，如果確屬元刊舊式，則可能是要表明該傳雖經改寫，但仍然是以白玉蟾原撰為基礎。至於趙宜真、劉淵然二人的傳、像並讚，則是邵以正有意新增加的內容，雖然明顯是對所據底本的改動，但二人既然是邵以正本人的先師祖、先師，邵以正又自居淨明嗣派弟子，那麼，在形式上也就還是符合《淨明忠孝全書》成書、流傳過程中所形成的續補先代宗師傳記的通例的。



日本內閣文庫藏本《淨明忠孝全書》之景泰三年壬申秋十月朔胡澹序

明景泰三年邵以正序刊本保留的傳記作者及相關信息，不僅提供新的材料，也提供重新審視淨明道史的契機。

就劉玉傳的作者署名而言，不僅可以澄清劉玉傳作者的問題，也可以借由許宗聖玉隆萬壽宮提舉的身份來重新認識元代淨明道的成立過程。如前所述，黃元吉受到〈淨明大道說〉降世的鼓舞，加入劉玉等人的降經活動。他的加入，首先當然是個人行為，但顯然具有超越一般個人皈依的意義。由於他是玉隆萬壽宮的道士，使得其拜入劉玉門下、參與降經的行為，一方面在象徵意義上，代表了由傳統的玉隆萬壽宮向新興的「騰勝道院」（或者「玉真壇」）的正統性轉移；另一方面也使劉玉等人的降經活動得以進入玉隆萬壽宮，依托清逸堂再行降經，從而也在實質意義上具有了獲得正統性與合法性的可能。因此，劉玉傳的寫作，由玉隆萬壽宮的提舉許宗聖而不是清逸堂的道士黃元吉來完成，很可能是有意向讀者展示，劉玉作為許遜淨明大道嫡傳者的身份、劉玉所創「新」淨明道作為接續南宋淨明道的正宗的地位獲得了認可。

而根據徐慧傳所保留的作者上官良佐跋，不僅可以知道該傳撰寫的時地背景、資料來源，也可以知道該傳撰寫的目的是「以繼于中黃師傳」。明清時代關於元代淨明道統緒的傳統記述，是劉玉、黃元吉、徐慧為遞代相承的三代祖師。這樣一個譜系是建立在《淨明忠孝全書》收錄三者傳記的基礎之上的。實際上，徐慧刊本是沒有徐慧傳，也不可能沒有徐慧傳的。根據〈中黃先生碑銘〉可以知道，黃元吉的嫡傳弟子是陳天和。而陳天和的身份則是玉隆萬壽宮清逸堂道士。從元代淨明道降經過程來看，在黃元吉加入以後，玉隆萬壽宮清逸堂便成為該教團的活動中心，也是正統所在。至於徐慧，則並未在黃元吉傳中列名，只是「不可備數」的衆多弟子之一，如果沒有徐慧傳，除根據徐慧序知道他是淨明弟子，曾刊行《淨明忠孝全書》以外，是不大可能將他視為三祖的。而徐慧傳的成立雖然以接承統緒為目的，但在明初重刊以前，如前所述，該傳可能只是在吉安의 個別宮觀中，以抄本的形式附入《淨明忠孝全書》而流傳。也就是說，除了徐慧自己的兒子及其弟子構成的吉安地方團體以外，元代淨明道並沒有形成以徐慧為淨明三祖的共識。

另外，上官良佐提到徐慧為他保奏《神霄總攝諸雷書》，表明徐慧是兼傳神霄雷法的。而這是可以與徐慧傳中所載臨終請弟子蕭尚賢代謝師仙將吏相印證的。由此，雖然不能直接證明劉玉、黃元吉一系也兼傳神霄雷法，從而改變以往對劉玉簡化道法的印象，至少可以承認，被後世接受為淨明正宗的徐慧一派是擅長雷法⁸。

陳天和、徐慧之後的淨明統緒不明，明清時代的傳統記述都是將趙宜真、劉淵然直接徐慧，作為淨明四傳、五傳。這一記述的源頭，一直以來並不明確，至此則可以知道是出自明景泰三年邵以正序刊本。據該本所收二人傳記，趙宜真、劉淵然被參學淨明弟子奉為嗣師。不論此種表述是傳記原作者所為還是邵以正刊刻時所增改，二人傳記補入《淨明忠孝全書》本身即有意向讀者表明他們是淨明派的嗣派正宗。實際上，邵以正在後序中也明確說他增補趙宜真、劉淵然傳記的目的就是「用續師派」。那麼，無論是從對相關敘述的史源追溯的立場，還是邵以正個人宗派意識的立場來看，趙宜真、劉淵然的宗派身份問題似乎也就得到了解決⁹。問題在於，一方面，趙宜真自居為清微嗣派正宗，並無嗣派淨明或者宗奉淨明的表達；另一方面，他與徐慧並無師授關係，其師曾貴寬與徐慧或其弟子目前也無證據表明有師授關係，因而從徐慧到趙宜真的傳承實際上是無法銜接的。而且邵以正本身在景泰、天順之際已改變立場，不再自居淨明嗣派，甚至可能曾追改趙、劉二傳，導致在他授意下撰寫的幾種相關碑傳之間出現差異甚至矛盾。因此，僅就明景泰三年邵以正序刊本，並不足以最終確定趙宜真、劉淵然二人在歷史上的真正宗派身份¹⁰。

當然，歷史上的真實情況只是研究者的關注所在，卻未必是該教派成員



日本內閣文庫藏本《淨明忠孝全書》中劉玉畫像



日本內閣文庫藏本《淨明忠孝全書》中趙宜真畫像



日本內閣文庫藏本《淨明忠孝全書》中劉淵然畫像

所關心的問題。不論趙宜真、劉淵然在歷史上與淨明道究竟有何關係，邵以正增補二人傳記都對淨明道的歷史敘述產生了深遠影響。不僅明萬曆時李鼎所編《淨明忠孝經傳正訛》、清青雲譜刊本《太上靈寶淨明宗教錄》、清刊三種版本《逍遙山萬壽宮志》等的歷史文獻均收錄有二人傳記，並且今日所見清末以來流傳的淨明科儀所召請的列聖先師亦為劉玉、黃元吉、徐慧、趙宜真、劉淵然的譜系。至於邵以正本人，由於他的宗派立場發生改變，更由於他身後未能有傳記補入《淨明忠孝全書》，作為淨明嗣派，除了清鈔本《丹亭真人盧祖師廣胎息經》附錄的所謂「淨明宗譜」以外，並沒有被淨明派的歷史敘述以及科儀傳統所承認。

四

在《淨明忠孝全書》現存諸種版本中，以明《正統道藏》本最為通行。但明《正統道藏》本在刊入《道藏》時經歷過重新的編輯，導致大量的信息缺失。明景泰三年邵以正序刊本儘管保留大量元刊本的特徵及相關信息，由於長期不為人所知，迄今幾乎未予利用。結合其他相關文獻，通過現存諸版本的對讀，不僅可以避免以往僅就單一文本進行研究可能存在的潛在問題，也可以啟發新的研究思路，進而對有關文本價值及歷史問題作多維的深度探討。

註釋：

1. 參見拙撰，《斷裂與建構：淨明道的歷史與文獻》第二章，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年版，頁39-66。
2. 參見拙撰，《〈淨明忠孝全書〉的刊行與元明之際淨明統緒的構建——以日本內閣文庫藏明景泰三年邵以正序刊本為中心》，《古典文獻研究》第十七輯上卷，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頁130。另，該文誤以校正者為魏希然，當改正。
3. 《天一閣書目》卷三之二，《續修四庫全書》第92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景印清嘉慶文選樓刊本，頁177。參見註1，頁69。
4. 臺灣李顯光先生藏殘本清嘉慶雲南刊本《淨明忠孝全書》附錄，葉卅二a。
5. 有關該記述可靠性的質疑，可參見拙撰，《自我認同與他者認同——趙宜真、劉淵然嗣派淨明問題的再探討》，待刊。
6. 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一〇一《諸王世系表二》，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頁2664。王世貞撰，魏連科點校，《弇山堂別集》卷三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頁617。
7. 陳清慧，《〈古今書刻〉版本考》，《文獻》2007年第四期，頁165。
8. 同註2，頁127。
9. 同上，頁133。
10. 關於趙宜真、劉淵然的道法、丹學師承及其宗派立場等方面的具體分析，參見註5。

中大論道—道教研究系列論壇預告（2015）

講題： Shared Paths to Perfection:
Dao Learning and the Golden Elixir (金丹)
講者： Professor Paul Crowe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時間： 2014年4月16日(週四)，19:00-20:30
地點： 香港中文大學梁銶琚樓303室

講題： 論呂祖詮釋之文昌大洞仙經章句
講者： 葉錦明教授(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時間： 2014年4月29日(週三)，19:00-20:30
地點： 香港中文大學梁銶琚樓303室

正式講題及時間、地點，請以此海報為準。如有垂詢，請致電：3943 4464

中大論道— 道教研究系列論壇講座紀要

一 .

2015年1月27日星期二下午，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的道教研究系列論壇第二十五講在香港中文大學梁銶琚樓303室舉行。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許蔚博士報告了〈新材料與舊問題：元明清淨明道統緒的再認識〉一題，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黎志添教授主持了論壇。

許蔚博士近年來致力於淨明道文獻的整理與淨明道史的重新梳理，並對過往淨明道研究中忽視或誤解的重大及前沿問題予以探討。在這次講座中，許博士結合新材料，對元明清時期淨明道的統緒問題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他首先概述了歷史上各個時期孝道/淨明道之間的差異和內在聯繫，涉及唐宋孝道派、南宋淨明道、元代淨明道以及包括青雲派在內的明清淨明運動等；並簡介了《淨明忠孝全書》現存版本情況，包括明景泰刊本、道藏本及清嘉慶刊本（殘本）等。隨後許博士展開淨明道統緒的探討。過往研究一般接受《逍遙山萬壽宮志》中列舉的劉玉、黃元吉、徐慧、趙宜真、劉淵然為正統的傳統看法。他則通過對大量文獻資料的考證和新舊材料的比勘，追溯了黃元吉、徐慧、趙宜真、劉淵然的事蹟和譜系。他指出徐慧雖在京師從黃元吉受《淨明忠孝》等書，但在《中黃先生碑銘》中沒有記載，為「不可備列」的眾人之一，原本尊重陳天和的嫡傳地位。但是徐慧弟子上官良佐為乃師作傳，明確提出「繼於中黃師傳」。由其傳記收入全書，徐慧遂被認同為三傳。許博士比較了趙宜真、劉淵然的幾種傳記資料，對趙宜真「淨明嗣師」和「清微宗系」兩種說法予以辨析，並分析了劉淵然傳記中「太極淨明」和「淨明如意仙丹」的可靠性及意義。他認為趙宜真、劉淵然被尊為淨明嗣師源於邵以正的宗派建構，此點不僅體現在明景泰刊本中二人傳記與其它記載的差異之上，更由邵以正《淨明忠孝全書後序》得到明確的證明。最後，他對清鈔本《丹亭真人盧祖師廣胎息經》中所記載譜系的可靠性予以討論，指出明清時代淨明運動中系譜的建構有其標榜正統及文獻相因的因素，也提出蕭真人與曾塵外交涉，以及以淨明派傳清微法的可能性。



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許蔚博士報告〈新材料與舊問題：元明清淨明道統緒的再認識〉一題



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黎志添教授向謝世維教授致送《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一書

二 .

2015年3月5日下午，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的道教研究系列論壇第二十六講在香港中文大學梁銶琚樓303室舉行。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的謝世維教授報告了〈道與法：宋元之後的道教、密教與地方宗教〉一題，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黎志添教授主持了論壇。

謝世維教授首先梳理了目前學者對「道」與「法」的關係有不同的態度，歷史上法術與道教的結合過程和緊密聯繫。他提出在歷史脈絡當中，「法」的界定依時代、區域而有變異，甚至成為道教融攝不同地方法術傳統的管道。簡單來看，宋代以來的「道」、「法」觀念界定在法術傳統與道教的聯繫性之上。換言之，在神譜系統與傳承體系上與道教連結的，即成為道教法術傳統。而未能神譜系統與傳承體系上與道教連結的，即被道教視為邪法或巫法。

謝世維教授認為，學術界現在已經逐漸釐清宋代以後，法術性的儀式如何逐漸與正統道教連結，而成為道教的一環。這種建構過程透過無數的高道、士人的努力，逐漸形成一種共識，進而成為新形態的道教。宋代的法術傳統以各種方式與道教結合。從整個宋代以來的宗教環境來看，可以體現許多區域法術系統試圖建立一個以道教為核心的「道統」，南宋以後的道教龍虎山、清微派即開始進行整合，並透過此體系吸納地方神祇，以此凌駕於當時興盛的民間佛教與國家大舉封敕的眾多祠神。

他從過去學者的論述中發現，所謂道教的「道、法」關係，在歷史上是呈現半開放、與民間區域的法術傳統互動、相融、連結，進而形成各種根源、基礎各異但又互相關連的法術傳統，從而豐富、卻也複雜化了道教的內涵與科儀。不過，在早期所謂「瑜伽教」之類的法術傳統卻與道教法術傳統關係較緊張，常被冠上「外法」、「邪法」的稱號。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類的佛教法術一直在各區域流傳，與「閩山」、「普庵」等法教傳統有密切關連，與區域道教傳統則有不同程度的互動關係。儘管兩者都共享了密教的咒法與儀式形態，但是在神譜與權力根源上有著本質的不同，因此相容性不大，可能直到帝制後期才在不同區域開始與道教的儀式傳統有不同程度的交涉。最後謝教授提出，近代「道」、「法」關係呈現更複雜的情況，在文獻研究上有需要進一步拓展，方能更細緻的探究其不同脈絡與內涵。

中大建立全球首個「道教數位博物館」

隨著資訊技術的發展，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工具已經被廣泛地應用於歷史和人文學科研究。然而，迄今世界上尚無一個專門用於道教研究的GIS資料庫。2015年，在香港中文大學黎志添教授主持下，道教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團隊成功建立全球首個「道教數位博物館」，將其長期有關廣東道教的學術研究成果數字化、網絡化。

廣州乃南中國珠江三角洲最大的城市。明代以來，廣州市及其周邊十三個州縣，坐落著數目眾多的廟宇。作為第一個階段的成果，2015年中大道教數位博物館主要收集了廣州及其周邊十三個州縣共150座道教廟宇的資料。這些資料大多以歷史文獻、建築、神像及碑文記錄的形式(包括至今尚存且未發表的拓本及從田野調查獲取的碑刻文字)保存下來，或者是來自地方志，道士和省/縣/市檔案館的檔案資料，也包括歷史地圖以及科儀文本。本道教數位博物館已經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廣州道教廟宇的資料庫目錄，並將這些資料錄入為電子檔案，同時利用地理資訊系統GIS建立一個合適的展現平臺和管理系統，用於維護、整理、展現和分析相關廟宇的空間和歷史特徵。

中大道教數位博物館不僅提供關於明清至現代廣州及其周邊十三個州縣道教廟宇的文字、歷史和空間資料，並且提供相關的三維模型/全景圖/視訊短片。

建成此道教數位博物館的目的，是希望推動道教研究和相關中國宗教的研究。有關研究學者，不僅能夠追溯單個廟宇的發展和地理變化，而且可以對所有的廣州廟宇的地理分佈以及其與廟宇周邊的社會經濟環境、人口背景、景觀和環境的時間/空間關係做定量的分析，從而可以從傳統的歷史文獻研究方法轉變到基於視覺化的時空維度的研究方法。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黎志添教授介紹道：「以往學界從事道教研究通常採用兩種辦法，一是通過歷史文獻、經典等文字資料進行考據和分析，二是對廟宇、神像及周遭社區進行田野考察。運用科技手段建立道教數位博物館，是想要將兩種傳統的研究方式結合在一起，同時呈現出各地宮觀廟宇的文獻資料及文物、空間資訊。這個平台不僅可幫助專業學者做好研究，更可向普羅大眾普及中國道教文化。道教數位博物館的另一特點是，它是一個具有生命力的平台，可以不斷增加新的成員資料，還可以更新原有宮觀廟宇的變化，以科技手段記錄及呈現出一座廟宇所經歷的歷史流變與周遭地理環境互動的結果。」目前在博物館平台上展示的150座道教廟宇皆位於廣州地區，匯集了黎志添教授過去十五年的學術成果，每一座廟宇的文圖、影視資料皆是他與研究人員和學生赴實地考察採集、整理而得，極具學術嚴謹性。他透露「道教數位博物館」會在下一階段逐步充實港澳地區道教宮觀廟宇的資料，未來還會不斷增加「新成員」。

道教數位博物館的特點有以下十個方面：

1、WEB-GIS 平台

本數位博物館選用了當代網絡技術、電子地圖及地理信息技術作為系統的核心，建立了一個互動的網絡平台，讓用戶透過空間定位，更好地把握廟宇位置以及廟宇之間的空間關係，同時搜尋廟宇內的相關資料。

2、廟宇為核心

在第一階段，本數位博物館選擇了150座廣州地區道教廟宇用以展示。之所以選用廟宇，是因為廟宇是道教信仰活動發生的主要空間，廟宇內建築、碑刻、神壇、儀式等等，都記錄和反映了廟宇的歷史發展和真實面貌。

3、互動性

用戶在使用本數位博物館時，可以按各自的興趣，隨意切換到不同的部份，例如碑刻、神像或科儀，又可以瀏覽圖片或相關研究資料；同時用戶可以針對碑刻釋文及科儀文字本進行個別字詞的搜索。

4、內容豐富性

用戶可利用本數位博物館瀏覽不同道教廟宇資料，包括廟宇基本資訊、廟宇參考資料、廟宇照片、神像照片、碑文內容及提要，以及道教科儀本及錄像等。

5、平台兼容性

不同用戶所使用的瀏覽器往往會有差異。本數位博物館特別選用能支持跨瀏覽器的開發技術及平台，從而確保用戶在使用不同瀏覽器時，均能收到最佳的瀏覽效果。

6、地圖瀏覽界面

地圖瀏覽界面為本數位博物館的主體框架，用戶除了可以在電子地圖上瀏覽廟宇位置及空間分佈外，還可以對博物館所存的資料進行搜索；並在此主體框架上，瀏覽及切換至不同系統部份，對不同的道教廟宇資料瀏覽。

7、廟宇系統

廟宇系統為本數位博物館的核心部份，用戶可以點選及瀏覽廟宇的基本資訊、廟宇照片、全景照片、廟宇神像照片、廟宇參考資料、廟宇碑刻、碑刻釋文和提要，以及與碑刻有關的參考資料。

8、神像系統

神像系統為本數位博物館的子功能部份，用戶可按類別瀏覽神像，並以列表方式，了解神像所在的廟宇及廟宇的詳細資料，同時觀賞神像的藝術面貌。

9、科儀系統

科儀系統為本數位博物館的子功能部份，用戶可按類別瀏覽道教科儀本、校對後的文字本及儀式錄像。

10、全景照片系統

全景照片系統為道教數位博物館的子功能部份，用戶可從廟宇列表中瀏覽廟宇的全景照片，播放模式分為自動及手動兩種。

歡迎大家註冊成為「道教數位博物館」的用戶，上網瀏覽博物館並提供寶貴意見，請將您的意見發送至電子郵箱：digitalmuseum@cuhk.edu.hk。

用戶意見可以是有關：1.本系統的使用與功能；2.本系統收錄的資料信息。同時歡迎為本系統提供補充資料與信息。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暨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合辦 道教文化證書課程 2015-2016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Daoist Culture

課程介紹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是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石之一。道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共生共存，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人的信仰、人生思想和道德傳統。可以說，要想真正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就一定要從道教文化的認識開始。

為了進一步提昇大眾對道教文化的認識，協助文化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及道教神職人員回應社會大眾對道教知識的渴求，自2006年開始，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聯同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舉辦道教文化證書課程，每年邀請不同的專家學者，講授道教文化的內涵。

課程特色

課程將會涉及多個面向，讓學生對道教文化建立一個宏觀的認識。課程內容包括：

道教文化基礎知識
道教發展史
宮觀考察
道教養生
道教生死觀
道教藝術
道教與中國文化
道教與易經及術數
道教經典與科儀

對象

本課程適合教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包括文化旅遊及相關產業）、道教及其他宗教的神職人員，以及對道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興趣，具中五以上程度之人士修讀。

課程安排

本課程於每年9月份開課，至次年8月結束。每星期上課一次，每次2小時，每16學時（約8星期）為1單元。共6個獨立單元，96學時。

授課語言以粵語為主，輔以普通話及英語。

報名費

港幣150元（無論取錄與否，報名費概不退還及不得轉讓）。

學費

港幣9,800元**。除此之外，每單元之教科書及實地考察費用由學員自付。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每年均撥款設立「道教文化證書課程獎學金」，成績優良的同學可獲一半學費資助。詳情請致電3943 1103向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職員查詢，或蒞臨諮詢講座查詢。

** 已繳學費，概不退還及不得轉讓。

報名手續

申請人需填妥學歷及專業課程報名表格*並附：

香港身份證、學歷證明文件影印本、報名費及學費支票（抬頭：香港中文大學）。

郵寄至：沙田香港中文大學博文苑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人文學科課程組收

*報名表格可於網址：<http://www.scs.cuhk.edu.hk> 下載

課程諮詢講座

日期：2015年7月4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4:00-5:00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尖沙咀東海教學中心
尖沙咀加連威老道98號 (港鐵紅磡站 D1 出口)
東海商業中心地庫04室

留座電話：3943-1103



課程詳情

道教文化證書課程包括6個獨立單元，共96學時，分別教授及討論以下專題：

道教文化基礎知識 (單元一)

本課程將通過課堂講授，使學生了解道教的起源、發展過程及流派，了解道教的各種經本及《道藏》的情況，了解道教的神仙信仰及神仙譜系、在民間的信仰情況等基本知識，以及思考道教如何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深遠影響，並滲透於中國人的意識形態之中。

道教生死信仰與養生文化 (單元二)

本課程將通過課堂講授，使學生了解道教傳統的生死觀及神學觀，包括神仙、長生、不死、鬼界及陰間等思想及其理論，了解道教在生死思想上的實踐方式，包括道教如何通過不同的養生法、內丹法、食治法等，以達到生死思想中所追求的目標。

香港道教與宮觀考察 (單元三)

本課程一方面將通過課堂講授，使學生認識中國近代道教與香港道教的發展歷史，及其與傳統道教歷史的關係；另一方面將結合田野考察的形式，以本地道觀、道堂為實例，使學生了解香港道教在宮觀建築、神祀情況、科儀活動、扶乩活動等方面的本地特色，以更好地認識香港道教的獨特性與豐富性。

道教經典與科儀 (單元四)

本課程將以課堂講授為主，多媒體播放為輔，一方面使學生了解道教經典的形成、在道藏中的分佈情況，另一方面使學生了解道教科儀的形成與發展歷史、科儀的分類及各自特色，與科儀中的節次及其含義。通過本課程，學員可以了解道教經典與道教科儀傳統的概況，其思想及實際運用情況。

道教與中國文化及藝術 (單元五)

本課程將通過課堂講授和實物展示的方式，使學生了解道教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與作用，道教對中國藝術產生的影響，同時了解道教藝術的表現形式，以及藝術對道教發展的意義，從而認識到道教與中國文化、道教與中國藝術之間的互動與相互關係。

道教與易經及術數 (單元六)

本課程將通過課堂講授，使學生了解道教文化中易經及術數的應用，從而使學員認識到術數的基本原理和思想，以及易經對道教宇宙觀和修煉的影響。

Daoism: Religion, History and Society No. 6 (2014) 《道教研究學報：宗教、歷史與社會》第六期



本中心與法國遠東學院合作出版的《道教研究學報：宗教、歷史與社會》第六期已於2014年12月出版。本期刊設有「此命可改乎？道教的命運觀」特輯，論文、研究綜述和書評四個類別，有英文及中文論文9篇，內容涉及道教的命運觀、南陽地方道教研究、南宋道教研究等，並有六篇書評介紹近年出版的六部中英文道教研究著作。

Research Note: Buddhism in the Writings of Tao Hongjing

研究報告：陶弘景著作中的佛教因素

Stephen R. Bokenkamp 柏夷

本研究報告提供了兩點證據，要求我們應重新考慮過去被認為是正確的觀點，即道經大量借用佛教元素的情形最早出現於五世紀初的靈寶經中。本文中列舉的兩個例子表明（佛教的）輪迴觀以及由其他諸多世界體系所組成的大宇宙不僅出現在陶弘景的著作中，也可見於由他所收集並注解的上清經裏。對研究道教的現代學者們來說，「壞」消息是本研究報告中所列舉的例子也表明——早在六世紀末，道教徒已經開始系統性地剔除其經典中所借用的佛教因素。

Options for Molding Ming (Fate) in the Scripture on Great Peace

《太平經》中的改命途徑

Barbara Hendrichske 芭芭拉·亨德施克

本論文介紹了最早成書於公元二世紀的《太平經》中所記載的對「命」的多種理解，這些理解與其作者們所宣揚的多套道德和宗教教化相關。對他們而言，好命與壞命的區分表現在生命的長短，他們使信眾確信只要堅守正道，就會帶來長生。這種許諾似乎又與人生來即各自有命的觀念有些矛盾。作者們並沒有否認這個觀念，而是提出其他並行的看法，以限制命定論的影響。在這裏，天賞善罰惡的形象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同時，個人命運也與集體命運息息相關。長篇經文中的不同部分提供了彼此相異的改命途徑。在「天法」文本中，個人命運取決於他對天地自然規律的認識與適應程度。「太平」文本的作者則展現了一個集體生活隨時面臨災難的歷史處境，個人命運因此與其對社會改革和其他社會拯救活動的支持緊密聯繫。「守神」文本強調了先天的生理條件；然而，其作者又認為若個人能夠多加留意自己的行為，他可以使得天或體內外的神靈改善其命。「大化」文本中的改命則可僅通過修身自省，以及對天滿懷感恩之心而達到。

南宋道教研究述評

謝一峰

本文擬以南宋的道教研究為限，兼及北宋後期的道教研究，盡可能彙集中、日和歐美學界的研究成果，以期對這一階段道教的研究史和最新的趨勢進行一較為系統的梳理。本文並著重評介道教和政治，尤其是國家祀典的關係；士人、僧人和道教的互動與三教合一；道派、道士、道法；道教聖地與區域性研究；和道教藝術五個方面的研究成果。



The Sword Scripture: Recovering and Interpreting a Lost 4th-Century Daoist Method for Cheating Death

道教的詐死之術：《劍經》佚文的重新整理與詮釋

Robert Ford Campany 康若柏

本論文將重新詮釋散見於各種文獻中的上清道書：《劍經》的佚文，並主張該作品指定了一種稱為「尸解」的古老修行方法。雖然該經並未向信徒許諾此種修習方法可以使人達致「真人」的境界，但其中也提供了向上清啟示的早期接受者們推薦這種方法的原因。

Drugs, Destiny, and Disease in Medieval China: Situating Knowledge in Context

反思藥物、命和病理學與中國中古道教：知識的情景轉變

Michael Stanley-Baker 徐源

長久以來，人們認為謝罪儀式和藥物治療建基於不同的理論基礎之上，因此這兩種治療法是無可相容或互相配用的，而四世紀的《真誥》誥文就是持上述觀點之人的重要資源。但細查《真誥》時，我們發現其實藥物和儀式治療經常被用於一個治療體系。其中的啟示者，祭酒楊羲在啟示病因理論的同時，也介紹配用儀式和藥物治療的可能性。因此，這值得我們從這些當時人物的角度，重新審視宗教和醫藥分離的歷史論述。

如果《真誥》中的人物不是從宗教和醫學的角度組織他們的治療知識，那麼他們採用了甚麼方法？從他們本身的社會體制結構中的知識循環和分等，就能看到最大的分別在於明傳和秘傳知識，它們有著截然不同的傳授方式、治療概念、醫學文化和病原論。此兩種知識之間的區分並不在於宗教或醫學的差異，而是對命的兩種不同潛在觀念，同時影響著改命的方法和範圍。

Destiny, Vital Force, or Existence? On the Meanings of *Ming* in Daoist Internal Alchemy and Its Relation to *Xing* or Human Nature

命運，生氣，或存在？論道教內丹中「命」
之意義及其與「性」的關係

Fabrizio Pregadio 玄英

內丹發展出了兩種不同的修煉模式。第一種模式建立在修心的基礎上，致力於去除妨礙人們「見性」的因素，而其中的「性」即金丹。第二種模式旨在煉精、氣、神，從而使其成為金丹的成分。這兩種修身模式分別強調「性」或「命」；然而內丹作品卻再三重申，要想理解並成就性與命，必須將二者結合起來。

在內丹，性與命是「體」和「用」的關係，與「神」和「氣」相對應，並分別關聯「心」與「身」。以這種看法為基礎，兩大內丹流派展開了關於性與命的論述：南宗的「先命後性」和北宗的「先性後命」。儘管有此等差異，「性命雙修」才是內丹真正的主題。因此，所謂的「先」是指將性與命中的任何一個作為修煉另一個的基礎，從而達到既「了性」又「了命」的目的。

文章的最後部分將具體分析兩位內丹大家的觀點。李道純（13世紀後期）提出，性與命指的是「天心」與「法身」，而並非現代意義上的精神與身體，後者實則損害一個人的性與命。與此類似，劉一明（1734-1821）也提出了「假」性命和「真」性命的本質區分：前者是一個人的「氣質」與「天數」（包括壽命），而後者是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本性（「良知」與「良能」）及「道之一氣」的具體化。

Physicians, Quanzhen Daoists, and Folk Cult of the Sage of Medicine in Nanyang, 1540s-1950s

明末至民初南陽的醫林、全真道士以及民間醫聖崇信

Xun LIU 劉迅

本文考察明末至民初南陽醫林，全真道士以及普通病患和張機（仲景，150-211）崇信者在當地三皇廟和醫聖祠密切互動的歷史。作者運用以前從未使用的廟碑、現存文獻以及田野調查所發現的證據，展示了全真南無派廟祝不僅在醫聖祠和三皇廟的維護以及日常活動方面具有關鍵作用，同時他們還在當地醫林祭祀三皇先醫，尤其是醫聖張機的祭獻儀式以及醫林會館談醫論治的聚會中，擔任舉足輕重的角色。全真道士們利用他們作為廟祝的特殊地位，與當地醫林和縉紳精英建立了長期的合作關係。正是憑藉這些關係以及全真宗派集團自身內部結構的強勢，這些全真南無派廟祝在與其醫林僱主的交往中，在形塑當地張機醫聖崇拜的過程中，以及在主導並傳播諸如醫聖藥籤之類非正統的民間祭祝療法和信仰的過程中，都具備了非常大的主動性和影響力。

Both printed and online versions are available.
Please download subscription form of print
version from our website:

請於本中心網頁下載印刷本訂購表格：

http://dao.crs.cuhk.edu.hk/ch/drhs_index.html

Daoism: Religion, History and Society is also
available online via EBSCO host.

The Performanc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Merging the Pneumas (*Heqi*) Rite in Early Daoism

早期天師道合炁儀式的踐行與意義

Terry F. Kleeman 祁泰履

早期天師道的「合炁」儀式從張道陵創教的二世紀中葉一直秘傳到宋代，為天師道的核心儀式活動之一。雖已有數位道教研究學者對合炁儀式進行過仔細研究，不明之處仍然甚多，甚至對於儀式的最終目標、實踐過程、時間、地點以及參與者的人數與身份都未有全面的了解。本文將檢視現存道教經典，包括與該儀式直接有關的經典和指出其不正確施行方式的科範類材料，還有來自道教外部的對該儀式的批評。由於「合炁」是一種秘傳儀式，天師道經典系統內並不存在一部權威性儀式文本；而現存的《黃書》和《上清黃書過度儀》都屬於上清經系，因此無法作為了解天師道儀式的可靠證據。與此相似，佛教論辯資料中所描繪的儀式樣貌雖可辨識，卻未必完全正確。《道藏》中的間接證據顯示普通的天師道道士也會定期施行儀式，並非局限於祭酒。作為儀式的教導者與傳授者，天師道祭酒扮演著特殊的角色。合炁儀式之目的在於消災，這在《上清黃書過度儀》中表現為著名於「長生玉曆」之上；而防止「更相嫉妬」似也是其一個重要的近期目標。

Modern Daoist Eschatology: Spirit-Writing and Elite Soteriolog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近代道教的救劫論：扶乩與清代文人的拯救觀

Vincent Goossaert 高萬桑

本文探討了一批在十八至十九世紀間，由文人扶乩並出版的經典。這些經典提出了一種救世論，末世之「劫」所帶來的威脅在其中相當重要，文人精英們有責任引領一場教化運動，才可彌災消劫。首先，本文將展示出扶乩啟示、文昌信仰與宋代道經中救劫論之間的緊密聯繫，這種聯繫延續到了清代，甚至變得更為強化。其次，在討論了與文昌、呂祖和其它信仰有關的幾個乩壇和文獻之後，論文將深究這些經典中的論述究竟在何種程度上能夠真正被稱為「救劫論」。本文認為這種論述應該被視為是早期和近代（如白蓮等教）的末日救世主之說的轉變，或是一種「反話語」，它維持了末劫的觀念，卻常規化了救世主，由此把救劫與皇帝的天命這兩種論述分別開來。

Book Reviews 書評

- ▶ *Ritual Words: Daoist Liturgy and the Confucian Liumen Tradition in Sichuan Province*, by Volker Olles Yuria Mori
- ▶ *Declarations to the Perfected, Part One: Setting Scripts and Images into Motion*, by Thomas E. Smith
- ▶ Michael Stanley-Baker
- ▶ 謝聰輝著，《新天帝之命：玉皇、梓潼與飛鸞》- 許蔚
- ▶ 謝世維著，《大梵彌羅：中古時期道教經典當中的佛教》- 張超然
- ▶ 蓋建民著，《道教金丹派南宗考論》- 許蔚
- ▶ 劉屹著，《敦煌道經與中古道教》- 李蘇書

道教研究學術論叢系列之 The Empress and the Heavenly Masters: A Study of the *Ordination Scroll of Empress Zhang (1493)* 一書將於2015年6月 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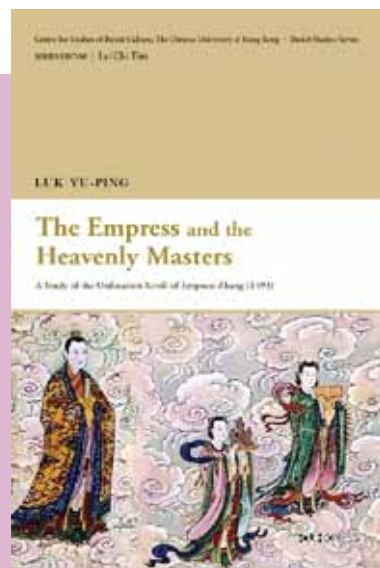
摘要：

自從五代開始，很多中國皇帝和皇室成員都接受過道士的授籙。但是由於相關資料稀少，這些儀式沒有被深入了解。現藏於美國聖地亞哥藝術博物館製作於1493年的《張皇后授籙卷》是一份對皇室道教授籙過程的非常重要的記錄。授籙卷有二十七米之長，以圖片和文字的形式記載了明朝弘治皇帝(1488-1505)的妻子張皇后(1470-1541)被正一派第四十七代天師張玄慶(?-1509)授籙的儀式。這是非常稀有傳給皇室授籙者的一件物品，包含道教授籙儀式的性質和內容的豐富信息。此外，它也讓我們得以窺見這種儀式對皇室女性的重要性。

本書以出版於2000年的《道教和中國藝術》展覽圖錄為基礎，對《張皇后授籙卷》作出第一次深入研究。本書以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集中於張皇后授籙儀式的歷史背景，分析了這個事件與皇家授籙制度、張皇后的個人生平與明朝中期正一派天師的地位的關係；第二部分仔細研究了授籙卷本身的內容，特別是被描繪的神仙的身份，以及傳給皇后的經文和符號。最後，附錄中有對授籙卷的主要文字的完整翻譯。

作者介紹：

作者陸於平(Luk, Yu-ping)博士分別在香港大學藝術系和牛津大學藝術史系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她曾擔任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助理館長，香港嶺南大學視覺研究系助理教授，2013-2014年擔任大英博物館亞洲部項目研究員，參與籌辦《明：皇朝盛世五十年》展覽。她現任英國國立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亞洲部研究員。



Daoist Studies Series 道教研究學術論叢

In order to advance the academic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on Daoist studies, the Centre has entered into an agreement with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o publish two "Daoist Studies Series", one in English and one in Chinese. Each of the series is projected to release one book each year.

The scope of the series is broadly defined as all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to the study of Daoism. We call for submissions of book manuscripts of original scholarship, in either English or Chinese, which explore Daoism in its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from pre-modern to contemporary period. Submissions will be peer-reviewed and be endorsed by an academic advisory board.

為了提高道教學術研究水平，擴大道教研究出版，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與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於近日簽署協議，合作出版「道教研究學術論叢」，分為中文、英文兩個系列，每個系列每年將出版一本道教研究著作。

我們熱忱歡迎原創性的中文或英文書稿加入「道教研究學術論叢」，無論是從社會科學角度或是人文科學角度進行的道教研究，探究道教發展的社會、歷史處境，包括從中古至近代時期。來稿將會接受匿名評審及學術委員會的審核。

若有稿件惠賜，請電郵至：daoist@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梁詠瑤樓218室
電郵：daoist@cuhk.edu.hk

電話：(852) 3943 4464

傳真：(852) 3943 4463

網址：<http://www.cuhk.edu.hk/crs/dao>

Facebook 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cuhkdaocul>

印刷數量：2,500份

通訊出版小組

編輯：黎志添
執行編輯：劉希

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與道教蓬瀛仙館合辦)
版權所有 不得轉載



道漢仙館